

近代日本言語創製のアジア的意味

石 剛

要旨：

言語と社会との関係を考える場合、言語観念変化に対する考察が重要な手がかりを提供してくれるのである。ソシユール以来、言語学は学科として他の自然科学と同じような地位を得るために、言語「そのもの自体」として研究されるようになり、その努力も確かに目覚ましい成果を収めてきたが、しかし、言語からその歴史性と言語変化、そしてなによりも人間との関わりを取り除いただけに、これまた新しい問題をもたらした。本論文では、日本と中国の近代言語創製過程に反映された言語観念の変化を中心に、近代国民国家と民族の理念に与えた影響を検証する。なかんずく、一歩先行した日本の経験が如何様に中国の近代性形成に影響を及ぼしたかについて探求を試みた。近代中国の言語生活状況、言語教育、文字改革、言語共同体意識の形成などには、いずれも日本からの影響があったからである。中国にとっては、日本という特殊な存在が極めて重要であることが言うまでもないが、場合によっては単なる外的な他者同士としてではなく、お互いに深く影響しあう、複雑に入り込んでいる相互関係にある存在として、今日の問題とその歴史的遺産を理解する時に見逃せない重要な意味を持つものと考えられる。その場合は、言語イデオロギーからの追及も一つの手がかりとなるだろう。

本文對於東亞地區（主要是日本和中国）近現代語言系統的創制過程及其觀念變化加以探討，以“國語”概念的形成為線索考究社會語言意識在歷史進程中的發展脈絡，考察在近代文化和意識形態形成過程中日本的

語言觀及其諸概念傳入中國的狀況。着重解析日本的國語觀念對中國的影響究竟如何，并與東亞地區的語言思想以及語言政策進行比較研究，其中包括語言生活狀況，語文教育和文字改革，語言歸屬感等問題。在這一東亞視角之下將19世紀後半以來日本語言觀念形成過程這一特殊的“他者”作為中國的參照系，從社會語言學的立場理解并剖析中國的語言政策和語言觀念。

1、語言與人，語言與意識

對於人與語言，語言與社會的關係，人們已經從各個學科的研究角度，利用不同研究手法進行了多方探討，以求獲得真知灼見。從動物行為學到文化人類學，從哲學到歷史學，還有心理學，社會學等等，當然更少不了語言學。但是它至今依然還在刺激著人們智慧的好奇心，孜孜以求加以探索。這一事實本身，卻從另一個方面說明了問題看來足夠複雜，不容樂觀。

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具體的個人來說，語言都曾經是一種最具有“不言自明”意義的，作為他自身存在的現實而呈現出來的一種幾乎近似于生理現象的狀態。這也可以稱之為語言的身體性。假定他是一個沒有受過專門語言學訓練的人，在日常生活中說著自己固有的話語時，他不會也沒有必要意識到自己講著的是一種叫做“某某語”的東西。他只不過是在“說話”而已。當然也不會自覺意識到要按照文法學家們制定的語法去說話。他或許會經常遭遇由於語言表述不清，理解失誤等而帶來的不便或者麻煩，這也如同生活中走路時偶爾摔倒那樣自然。愛德華·薩丕爾在那個廣為人知的比喻中曾提到，說話之於人，雖然還趕不上呼吸那樣自然，可終究如學會走路一般的順理成章或理所當然。（薩丕爾1921）當然，與學走路的根本不同之處，在於學習說話要有一個必須的條件，就是需要一個特定的社會，文化環境。因為學說話的過程不可能單憑生理的，先天的能力完成。不出意外的話，他會這樣一直成長，生活，直至生命終結。

但不幸的是，假如有一天他被告知，他說著的是一種叫做某某語的“語言”，或者他說的是某某語的“方言”，或者是某某國的“國語”，那麼情形就會發生一個意想不到的變化。因為從這一刻起，這種語言學上的論斷在實際上作為一種本質上從他的語言生活中異化出來的“知識”進入了他的世界，由此他的語言生活和意識便踏上了一條發生了質變的，異化的不歸路。

也可以說，如果一旦他具有了這種意識，那就需要為這個“說話”的行為尋求某種根據或目的，由“說”演繹出來的語言在這個時候將會被當作先驗於“說”的一個實體或體系，它們被預先設定為早已存在於，或隱藏於某處，例如詞典或文法書中。如同一個工具或道具存放在倉庫裏。說的極端一點，這時候他似乎不是在“說”自己的話，而更像是變成了一架“留聲機”。

這樣一來，本來無法從具體的心理活動和話語行為的境遇中分離的“語言”，在這情況下就有可能真的變成人們常常喜歡比喻作的，外在的“工具”。在這裡應該注意的是，工具這個貌似貼切的隱喻基于社會現象的經驗性認識而极易获得同感，并且由於它表述得惟妙惟肖，所以會使人們信以為真且往往深信不疑，但是其中卻包含了決定性的欺瞞和誤導。因为它忘記並掩蓋了語言歷史性的異化過程，扭曲了語言的本来面目，把人們的意識引向歧途。我們說的“似是而非”，常常就是指這樣的一種情形。

語言複雜的生成過程會滲透和關聯到心理，生理，神經系統等身體結構最微妙之處，同時語言又是人作為社會一員，在集團內交流互動所須臾不可或缺的，人類之社會性的結晶。這決定了語言學作為一門學科，如果不能超越既有的學科界限，把生理學，心理學以及包括政治學，歷史學在內的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哲學等有關資源充分調動起來，僅僅靠使用盲人摸象那洋的方法加以研究，那就永遠無法接近它的真實面貌。

在接受了這種本質上被異化的“知識”即觀念之後，直接引導出的語言意識最終就如同安德森那個經典性的論述那樣，使其具有了營造出一種“想象的共同體”以及建立起特定的連帶關係的功能。雖然這看起來有些不可思議，但這個過程卻被很多歷史與社會的現實所證明。在宗教信仰的領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時間觀念的改變，資本主義與印刷術之間的交互作用，國家方言即國語的建立，等因素之中，國語的建立占有核心的重要地位。(安德森1983) 雖然這種語言共同體與作為政治共同體的“民族”意識同樣，不過是在心中的一種想象，即“虛構”的產物，卻因為有其發生的客觀機制和歷史條件，所以並非意味著憑空產生。

在东亚近代語境下形成的語言實體觀以及對語言共同體的認同意識，以及包括國家和民族等觀念群，經過一系列國家層面的操作，其中首先是國家主義教育，其次是包括軍隊，法律政令和各類近代社會制度的建立等等途徑，被植入人們心中並發揮其作用，而這種觀念一旦形成往往會變得

非常牢固。和一切其他偏見同樣，因為缺乏理智判斷而近乎執迷。語言共同體的想象（虛構）加上民族共同體的想象這雙重奇妙構造相結合的產物之一，就是下面將要論述的“國語”。為了思考這個過程以及其意識形態，在這裡以其誕生歷程為例，並觀照同時代中國的相應情形加以剖析。

2、東亞近代國家的出現與日本的國語

日本與中國同樣位於東亞，一衣帶水。作為近鄰，一千多年來恩恩怨怨，剪不斷理還亂，近年來更是處於十分敏感的時期，伴隨著近現代歷史進程，這一地區的勢力對比和國力的消長又發生了滄桑巨變。如果沒有一個高屋建瓴的文明史視野，不能用新的研究方法加以觀察，那麼很多事情在今天很難看清楚。尤其是涉及到中日各自國家，民族的定位，包括社會制度的迥異，以及思想，文化思潮生成和消長中發生的相互影響，還有一系列文化因素交叉關聯所導致的互為因果的復雜局面，這些都仍然是困擾我們視野的瓶頸。只要看近年來，以領土等問題為標誌的雙邊關係巨變，引發了在各領域的閉塞狀況，而在這一局勢面前，無論政界還是學界，都表現出了茫然無所措的窘迫，由此也多少可以窺見事態的深刻和嚴重。（石剛2014）

要直面並理解這些問題，或許暫且退離一步，嘗試從更長的歷史進程以及思想和文化史的視域加以觀察更為有效。例如從東亞地域研究的角度，運用社會語言學以及比較文化學的手法，考察在現代的語言體系和制度的建構過程中，社會的語言意識因何而發生變遷，產生了怎樣的結果，藉此謀求找到理解這筆歷史遺產的線索，也許不失為一條可行的路徑。因為正是這筆遺產在嚴重影響我們今日的生活。

在西學東漸潮流的沖湧之下，19世紀的日本和中國以及包括過去的漢字圈在內的東亞各區域都曾經被裹挾其中，魚龍混雜，一瀉千裏。其間兩國在語言文化思潮方面共同面臨過何種局面，相互有過何種交叉影響，就是我們要關注的重點。

首先來看日本。日本列島上的語言系統歸屬問題至今沒有定論。古代日本的語言狀況由於文獻學的局限目前還所知有限，單從有文字記載的日本的語言來看，它（們）與今日日本所使用的語言，即今日的“日本語”之間雖然存在某種傳承關係，但是在歷史變遷中卻也發生了極大變化，時至今日，它們之間的差異甚至比一種外語都有過之而無不及。人們在心目

中認定的，似乎是“古已有之”的日本語，其實只不過是一個近代的創制物而已。這在日本的語言學家中也早就有人指出過。例如在上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一位名叫龜井孝的語言學家就明確提出過這個觀點。

龜井孝說“如果不依不饒地還是要追問說：照這樣說來‘日本語’究竟是什麼？這個問題的話，那就只能回答說，這所謂的日本語已經絕對不是一個不言自明的概念了。因為不經過一番抽象的加工，在我們面前就不存在這麼一個統一的語言實體對象”（龜井1972）。他進一步舉例解釋道，“也就是說，雖然《萬葉集》（註：日本最早的詩歌集，大約成書於8世紀後半）的語言與20世紀日本的語言在其實質上無論有如何的不同，但是我們的意識仍然被某種東西引導，以相信它們就是‘同一個日本語的姿態’，那只能說，這並不是直接來自於純粹意義上的語言學的影響，而是在某種先入為主的固定觀念影響之下的一個武斷。這個武斷的結論不過是在潛意識裏把超越歷史的形而上學式的絕對存在（也可以說是作為一個神話）假定下來，由這種思想派生出來的而已”。

成書於奈良時期的《萬葉集》所記錄的語言多為大和地區貴族的語言，並且使用萬葉假名和直接使用漢字記錄詩作，那麼這部作品從現在日本人看來簡直完全可以稱作是一部雙重的“外語作品”。如果我們了解這種情況的話，讀了這個論述就更容易釋然。他在這裏揭示了人們思維深處語言觀的盲點甚至是虛妄，為後人認識日本的語言問題提示了一個全新的視角。至於為什麼人們會由衷相信這樣一個虛構的“神話”，龜井接著指出，這都是源於明治以來國家教育所取得的“成功”。這一點也正是需要討論的社會語言觀念變遷過程的重要內容。

既然歷時地來看，古代日本的語言與今天的語言有著根本的不同，我們無法籠統把它們放在一起歸類，那麼，說現在日本的“國語”以及“日語”作為一個新的創制而出現是基於什麼具體理由，這個“新”又是起源於何時呢？

衆所周知，明治以前的日本國家形態與中國有很大區別。幕府制度之下，武士政權自12世紀以來大權獨攬，置“公家”（天皇及貴族構成的朝廷系統）於一旁而自行其政，這與中國自戰國秦漢以來，在統一皇權之下的幕府（幕僚，家臣）制度有著本質的不同。更為主要的是，作為統一的古代國家的社會形態與語言狀況，日本也有其特殊性。幕府之下各地“大名”的地方

高度自治當然與自秦漢以來實施郡縣制的中國很不一樣，包括人員流動在內，社會結構相對穩定，由此而來的是，語言的地方性差異程度也超乎想象。面積狹小的日本在明治維新前竟然分為300多個“藩”，各藩之間語言差異之大甚至令人不可思議，相互交流則極其困難。

社會各階層包括社會認知和語言意識在內，老百姓更是只知有“殿樣”（各藩的大名）而不知有將軍，遑論天皇。明治日本的出發點就是面臨這樣一幅社會意識圖景。在19世紀的日本，並沒有一個統一的名稱來表示這個列島上所說著的各種語言，這種說法看起來雖然有些荒唐，卻正好反映了當時真實的語言狀況。當然這裏指的是口頭語，不是指文章書面語。文章書面語自有另外壹套以古代漢語文言文為基礎的書寫系統，恰如拉丁文之於中世紀以前的歐洲。

過去日本也有“和語”的叫法，但其含義並非完全如今日的日本語這樣的意思，主要指非漢語成分的日本固有的音韻的詞匯。更為一般的是把各地的語言稱作某某“辯”，例如把現在東京地區的話叫做“江戶辯”，把關西（大阪神戶一帶）話叫做“關西辯”，京都話叫“京都辯”等等，就是地方名稱加上這個“辯”。此外也有加上“言葉”來表示的，例如“江戶言葉”等。“言葉”在“和語”裏是語言的意思，這裏用“葉”這個字只表示一個日語的音，而不是在說“語言的葉片”。

這樣幾百個藩的不同語言當然無法有一個統一名稱，而且其間的差異之大甚至完全無法互通。這樣到了19世紀中葉，尤其是鴉片戰爭之後，西方勢力也在不斷覬覦日本，明治維新前後，各種政治的經濟的以及國際關係的局面促使日本接受西方的挑戰走上建立近代國家之路時，語言問題就成為當時的國家重臣和知識界一個關注的焦點。

明治初年，日本多次派出官員赴歐美視察，並派留學生留學。其中，擔任明治政府首任文部大臣（教育部長）的森有禮在1872年擔任駐美大使期間曾寫信給美國耶魯大學教授惠特尼（1827-1894），討論在近代化過程中日本語言對於國家的作用問題。森有禮在信中首先指出，“日本的口語無法適應帝國的人民日益增長的需要，即使用表音文字來轉寫，作為一個書面語要達成致用實屬太過寒酸。因此在我們之中有一股思潮，認為如果想要跟上時代的步伐，就應該採用一個充實而又被廣泛應用的歐洲語言。”（森有禮1872）這就是後來廣受非議的所謂“日本語廢止論”。而其中基於對森

有禮原意的誤解招來的批評也不在少數。在社會的轉型期，尤其是時代大的變遷中，人們的目光不約而同指向語言問題，這究竟是何緣故還有待深入考察。或許在這種社會變動的關鍵時期，對於作為人們生活和生存的最基本要素之一的語言的關注或許更容易凸顯出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語言問題對於社會和國家的確也是極為敏感和關鍵的大事。

森有禮在《日本的教育》的序言（全集第3卷213-267頁）中把日本的語言問題與日本國家的命運直接聯繫在一起，認為“在日本現代文明的步伐已經到達國民的內心，伴隨著這腳步，英語也在壓制著日語和漢語（註：他這裏說的日語指日本固有的，即作為口頭語言的“和語”，漢語指的是日本書寫語言中的古漢文因素），在這一情形下我們這寒酸的語言絕對不會在日本列島之外被使用，而是注定要服從英語的統治。特別是在蒸汽和電氣的力量正在全國逐步普及的現在更是如此。我們為追求知識一往無前的民族，要從西方的學術，藝術，宗教的寶庫中獲得主要的真理，就不能依靠這種不靠譜，不確切的交流媒體。日本的語言已經無法保持國家的法律。所有的理由都指明，我們應該放棄使用這個語言。”

如果我們理解，他當時面對的日本語言狀況呈現如下的複雜局面的話，也許就不會吃驚了。第一，口頭語言與書面語言的差距過大，書寫系統即書面語幾乎全部是古漢文因素為主。第二，各地域語言變體差異極大，互不相通。第三，詞匯貧乏，缺少表達近代社會出現的新概念（主要為西方哲學政治學及人文社會自然科學各領域）的學術語匯。森有禮的危機感就是由此而發。19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的日本，沒有一個如同今日般的語言共同體，甚至連“日本語”這一稱呼都沒有確立，這已經得到文獻上的證明（龜井1972）。下面進一步具體考察“國語”概念的成立過程。

包括口頭語和書面語在內的“日本語”這一名稱的確立如上所述，是明治前後日本作為近代國家起步之後逐步形成的。現在我們來觀察如今在日本最為常用，以至於人們錯覺為是古已有之的“國語”一詞是如何產生的。“國語”在日本各類學校中是一門主要學科，作為最常用詞之一，已經深深浸透到日常生活的所有層面。“國語”是一個古老的漢文詞匯，不言而喻，古今之間，詞義發生了巨大變化。以左丘明所著的《國語》（作者有爭議，這裏取司馬遷說）這本書為例，這裏的“國語”意思是指各國的歷史故事等等，與“國家的語言”這個現代概念沒有任何關係。那麼日本的“國語”

又是在什麼樣的歷史背景中，帶著何種意識形態誕生的呢？

作為一個近代的產物，日本的“國語”概念大約經歷了4個階段的發展才成為現在的形態。它的朦朧期或萌芽期，大約開始於19世紀中葉到80年代中期。其後隨著日本近代語言學創始人上田萬年（1867-1937）的登場，全新概念的國語進入了它的確立期，而完成於伊澤修二（1851-1917）在臺灣建立國語教習所的1890年代末期。它的成熟期的開端則可以上溯至1900年文部省頒布改定小學校令，最初明確規定在學校設立“國語”科目之時。

從20世紀初到70年代，歷經戰前戰中和戰後的各個階段動亂與戰火的洗礼，“國語”也經歷了它的“黃金”時代。而自20世紀80年代至今，則可以說步入了它的老年期，或叫做衰亡期（雖然仍是死而不僵）也許更為合適。因為如日中天的“國語”一方面已經深入了日本人意識的深處，也可以說已然化作了他們的血液（這是上田萬年喜歡的比喻），但是卻也依然無以挽回地開始了消亡的歷程。這個事實，似乎也暗示著後現代這一解構過程無法避免。

需要指出，“國語”概念的這一歷史步伐也正是與日本國民語言意識發展變化描繪出了一個重合的同步的軌跡。通過梳理這個關鍵詞語的概念史應該有助於我們認識近現代日本的語言狀況以及與中國的相互關聯，從而獲取有益的借鑒。

“國語”一詞，在日本19世紀中葉的文獻中偶有所見，但是意義並沒有，作為翻譯用詞它有時指一般的語言，有時候又指與漢語成分對立的日本固有的“和語”成分。連牧師詹姆斯·柯蒂斯·赫本編纂的那部著名的《和英語林集成》（1867年出版1872年再版）中，都沒有收錄“國語”一詞。其後又過了14年，直到1886年才正式收入這一詞條。

而與此同步，“國民”“民族”“臣民”“人民”等一系列密切相關的用語所構成的概念網之形成過程，也從其他側面顯示了國家觀念與國語觀念的相互關係。

但是，促使“國語”概念出世的條件正在逐步具備。這是伴隨以明治維新為象征的日本近代國家的創立，對西方的近代思潮吸收引進，國家意識的逐漸滲透加強而帶來的必然結果。明治前一年即1866年前島密就在給誕生的幕府將軍德川慶喜上呈的建白書《漢字禦廢止之儀》當中，就使用了“國語”，“禦國語”，“本邦語”等名稱。他使用的概念也是把國語與日本當時的漢字漢語成分對照使用的，並不是用來表示日本的國家語言。但是他同時提

出“國家之根本在於教育國民”的觀點。這種國家國民意識則與當時福澤諭吉等啟蒙思想家們的近代國家以及國民意識一脈相通，漸成氣候。

第二年明治維新發生後，他又在1869年寫了關於“國文教育”的建議書，其中再次使用了國語這個詞匯。與此同時西周等人也在文章中偶有所用。而主張“尊皇攘夷”的國學派在明治初年宣揚的以“皇國”為修飾語的一系列詞匯，如皇國語，皇國言之類的國粹主義色彩強烈的用語，經歷了80年代中期自由民權運動和歐化主義風潮之後漸漸淡出舞臺中心，代之以“帝國臣民”觀念為基礎的國民意識的確立和國家觀念的增強。這些是在明治政府大力推動下，通過頒布天皇的《軍人敕諭》(1882)，《帝國大學令》(1886)，《大日本帝國憲法》(1889)《教育敕語》(1890)等，由政府引導加上民間學者如福澤諭吉等人的宣傳鼓動，在建立國民共同體意識方面起到了極大作用。與此同時在普及教育，健全法制，富國強兵，推行新學，統一語言等方面也加緊了步伐。

但是，一直到19世紀90年代初，國語一詞還僅僅偶爾見於個別論述，並沒有真正在日本社會取得市民權，落地生根。即使是在同一作者所著的另一篇文章之中，也經常是幾種提法混用。反映了草創期概念的混亂以及語言意識認知的不均衡。而真正使“國語”在日本社會普及並在人們意識中得到認同的決定性事件，則發生在90年代中期的對外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前後。

3、上田萬年的國語觀與殖民地

1894年到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在日本叫做日清戰爭）是一個東亞國際局勢發生重大變革的標誌與轉折點。在日本社會的語言意識形成方面同樣如此。被稱為近代日本語言學創始人上田萬年正是在這場戰爭的硝煙之中返回了日本（石剛1993）。

上田萬年的語言學啟蒙老師張伯倫作為帝國大學的博言學科教授引導他學習歐洲的語言學理論。1890年9月他受文部省派遣赴歐洲修語言學。在德國他先後受業於柏林大学和萊比錫大学，於1894年6月在甲午戰爭開戰之中回到日本，任帝國大學博言學的教授，時年27歲。同年10月，他就做了那個有名的講演，即〈國語與國家〉，把“國家語言”的概念引入日本（田中1981）。

1895年他出版了《為了國語》一書，在其後記中表示，這書是在“一

邊聆聽著日清戰爭的捷報，一邊興奮地寫作出來的”作品（見上田萬年著《為了國語（全）》富山房1895年版）。他的名言是“國語是帝室的屏障”，又說國語是“帝室的忠臣，國民的慈母”，是“國民精神的血液”。他的這些提法令當時日本各界人士大開眼界，1942年他的學生，時任漢城帝國大學語言學教授的時枝誠記在論述殖民地朝鮮的語言政策的一篇文章中寫道，當時“上田博士激情澎湃的講演，代表了時代精神的最高潮，同時給予了國語學界和國語教育界極大的鼓舞，提出了目標。人們由此而獲得了信心，種下了愛護國語的觀念”。（時枝誠記1942年8月「朝鮮における國語政策及び國語教育の將來」『日本語』2卷8號56頁）

作為精神和理論上的準備，上田的國語觀對日本社會的影響是深遠的，作為日本語言政策的直接制定和參與者，他在其後也發揮了巨大作用。而與此同時，直接導致在應用層面上的重大事件則應該是在臺灣由伊澤修二創建的“國語教習所”發生的影響了。

根據以上考察可以看出，“國語”這一詞匯是在東西方民族主義思潮交匯衝撞，殖民地統治開始帶來了新的“他者”意識的社會巨大變化中應運而生的概念，在近現代化過程中它所發揮的作用遠遠不是一個簡單的詞匯可以涵蓋的。其中包含了太多的意識形態內容，濃縮了時代的精神和社會的意識流變，並隨著時間推移在殖民地統治結束之後依然經歷了新的蛻變，持續占據了日本社會語言意識形態和語言觀的核心位置，直至20世紀80年代局面才發生了重大的改觀。關於這個問題的詳細考證，已經另作專文論述，請參照。（石剛2014）

伊澤修二是日本近代國家主義教育以及音樂教育等方面的開拓者。1895年他在攻占基隆后的“尸橫遍地，炮聲隆隆”之中登上了臺灣島，作為首任臺灣總督府的負責教育的官員，在臺灣開始了利用“國語”同化臺灣人心的“要急事業”。他先是辦了“日本語教習所”，不久就改稱為“國語教習所”，以顯示征服下的台灣已是日本國之一部。

伊澤修二也是近代日本國家主義教育的倡導者。1902年保定蓮池書院院長吳汝倫，受當時清廷管學大臣張百熙推舉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在赴任前他首先到日本考察近代教育。據伊澤修二在接待他時就建議，回國後應該立即開始普及“國語”。對此吳汝倫在回國後寫的《東遊叢錄·與伊澤修二談話》中有明確記述道：“伊澤氏又曰：欲養成國民愛國心，須有以統一之。

統一為何？語言是也。語言之不一，公同之不便，團體之多礙，種種危害，不可悉數。（中略）前世人猶不知國語之為重者，猶今世之新發明，為足以助團體之凝結，增長愛國心也”（石剛2004）。自此以後，“國語”一詞连同其近代语境下的概念定义便传入中國，继而逐步落地生根。

4、國語觀念輸入與中國語言意識形態的變化

上述只是衆多例證中有代表性的一個。如果我們注意到，19世紀末最後10年在中國興起了切音字運動，隨後到20世紀初，以至有30幾種拼音字方案出臺這一事實，正好與日本的語言意識大變革相重合，可能更容易理解。當時，包括孫中山，章炳麟，梁啟超在內，革命派，維新派以及大批各類學人均旅居日本，而處於甲午戰爭到日俄戰爭前後的日本，正是民族主義思潮乃至帝國觀念高漲之時，國家主義語言觀念則與之相互呼應。

據記載，梁啟超就曾當面向章太炎以日本百姓送子參軍打仗，義無反顧為例，力陳日本民族主義教育之成功，從而對照反襯出中國民眾國家意識之低，他認為，要想變法自強，首先就需要學習日本，第一要務是必須提高國民的國家意識，而不是反滿革命。他的一席話當然為章太炎所嚴拒（陳永忠2012）。然而這也從另外一個角度，反映出日本當時的社會意識以及民眾中國家主義教育的成功，對於中國知識精英是一個很大的刺激。國語概念和帝國意識的導入和普及，同樣成為他們所認為必須效仿的重要問題。

這一時期，旅日學人及知識界人士譯介了日本的或經由日文轉譯了大量歐美書籍，引進了很多新詞匯。除了學術典籍的譯介，新詞語，新概念的輸入之外，20世紀初中日之間還有一個被稱之為“黃金十年”的時期，（阿部洋2005）指清末大批留學生赴日本學習，而中國則聘請大批“日本教習”前來執教的時期。對此已經有為數眾多的專門研究問世。（《清末日本教習與中國教育近代化》蔭山 雅博2011）這裏只是以此為例，說明當時日本新概念新詞語輸入渠道之多，範圍之廣。其中的國語概念應該是壹個突出的例證。例如1910年，江謙的《質問學部分年籌辦國語教育說貼》當中，就可見以下文章。“國語編輯，作始為艱，調查須悉。日本有國語調查委員會，附屬文部，所以期編訂組織之密，謀文語漸接旨階，而防傳習推廣以訛傳訛之誤。學部注意國語教育，是否亦仿日本成法，設國語編查委員會，以為專任編訂及補助研究之機關”。（江謙1910）江謙在這裏提到的日本國

語調查委員會，其中心人物就是前面提到的上田萬年（石剛2004）。

一般說來，語言政策和語言計劃的制定多為政府行為。其性格可以代表國家意志，直接或間接反映了為政者在語言文化，意識形態，民族關係，政策導向等方面的統治傾向和對社會的控制願望。但是，這些不僅僅關係到社會全體成員的切身利益和行為習慣，而且由於問題的性質，使得它不可能靠一朝一夕之功就可以取得顯著成果。同時這還是一個非常個人化的問題，人的意識也將發揮很大作用。

不過，在清季民初的特殊背景下，真正的語言政策其實並沒有能夠有效實施。原因就在於當時的政府形態和歷史背景。切音字時期的中國雖然有了日本的參照系，也具有了國語意識和相應的危機感，但是得不到國際權威一貫性的支持。倒臺前的清政府甚至在1910年對“官話字母”發出過禁令。封了“拼音官話書報社”。而另一方面又任用嚴復等人，組成特任股員會，審理官話和聲字母等提案。1911年6月，“中央教育會議”又通過了統一國語辦法案，但還沒有來的及實施，就遇上了辛亥革命。民國成立後，1912年由教育總長蔡元培領導召開了中央臨時教育會議，通過了采用註音字母的方案。第二年又召集讀音統一會，投票決定了約6500個漢字的“國定讀音”，後稱“老國音”。但是時勢動蕩，這個方案甚至連公布都沒有可能。

而學界和教育界對統一語言的熱情日益高漲，1916年，在北京成立了中華民國國語研究會，提出“統一國語”和“言文一致”兩大口號。要求北洋政府公布註音字母，把學校的國文科改為國語科，開展起了所謂的“國語運動”，主張通過教育盡快普及國語。以上可以看出，在日本國語觀念直接影響下，國內的語言意識形態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所不同的是，沒有像日本那樣，得到國家權威的，一貫性的強力支持，反而是由一部分學界和民間人士奔走呼號來牽引。這也為後來復雜的主張和運動的走向埋下了伏筆。

更為重要的問題在於，國語意識形態其後日益以一種畸形的方式滲透進入中國社會。與日本相比，其帶來的後遺症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大概與中國傳統的，長達2千年的專制文化有著某種內在關聯。在人類社會的文明程度日益發達的今天，這種現象看起來就愈加顯得很不和諧。這與本文開始時提到的如何尋找東亞地區共同因素，如何建立和諧的國際關係和共同體，都有直接聯繫。

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時代發展到了今天，19世紀後半到20世紀的那種國民國家觀念，偏狹或狂熱的民族主義，抑或是帝國思潮，至今仍然以隱形或顯現的形式支配人們的觀念。這不僅可以從語言觀念的延續性上得到揭示，也可以從社會思潮的諸多方面得到驗證。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如果希望找到問題的癥結，也還是要從歷史的角度，通過對東亞地區語言觀念，文化思潮的比較分析，結合不同的國情和歷史傳統以及現實局面，尋求類似於某種最大公約數的因素。這中間，可能還需要對這個具有高度倫理性的問題作深入分析。經過這一系列作業後，或許我們會對於這種閉塞的狀態有另外一個解讀。這種努力堅持下去，我們的思維就可能多少會從既成觀念——包括國語意識形態在內——的束縛中得到解脫，更多地獲得一些精神上的自由。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雲山學者講座教授/本學文學部教授)

本論文は2014年10月22日から24日にかけてマカオ理工学院〈言語と社会生活〉国際学術シンポジウムにおいて行われた大会基調演説を元に加筆修正されたものである。)

参考文献：

- 薩丕爾《語言論》(1921) [M] 商務印書館 1985
薩丕爾(Edward Sapir)《薩丕爾論語言、文化與人格》商務印書館 2011年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1983)增訂版譯文2011
田中克彥《語言與國家》日本岩波書店 1981年
石剛《殖民地統治與日本語》三元社 1993年
石剛〈近代東亞的語言政策與語言意識〉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 2004年
江謙《質問學部分年籌辦國語教育說帖》1910年
引自《清末文字改革文集》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8年
上田萬年《國語と國家と》1894年
上田萬年《國語のために》富山房 1895年
龜井孝〔《こくご》とは いかなる ことば なりや〕1971年
時枝誠記「朝鮮における國語政策及び國語教育の將來」『日本語』2卷1942年
吳汝倫《東遊叢錄》1902年—引自《清末文字改革文集》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8年
石剛〈東アジアの近代と言語認識〉日本成蹊大學文學部《成蹊人文研究》22號2014年